

#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海外  
精读

经典重译计划 ③ 不朽之作，值得重读  
彩绘精读本

##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著 郁喆隽◎选译

全彩插图 | 权威精读 | 名家导读

推动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

声名卓著又饱受争议的现代社会学经典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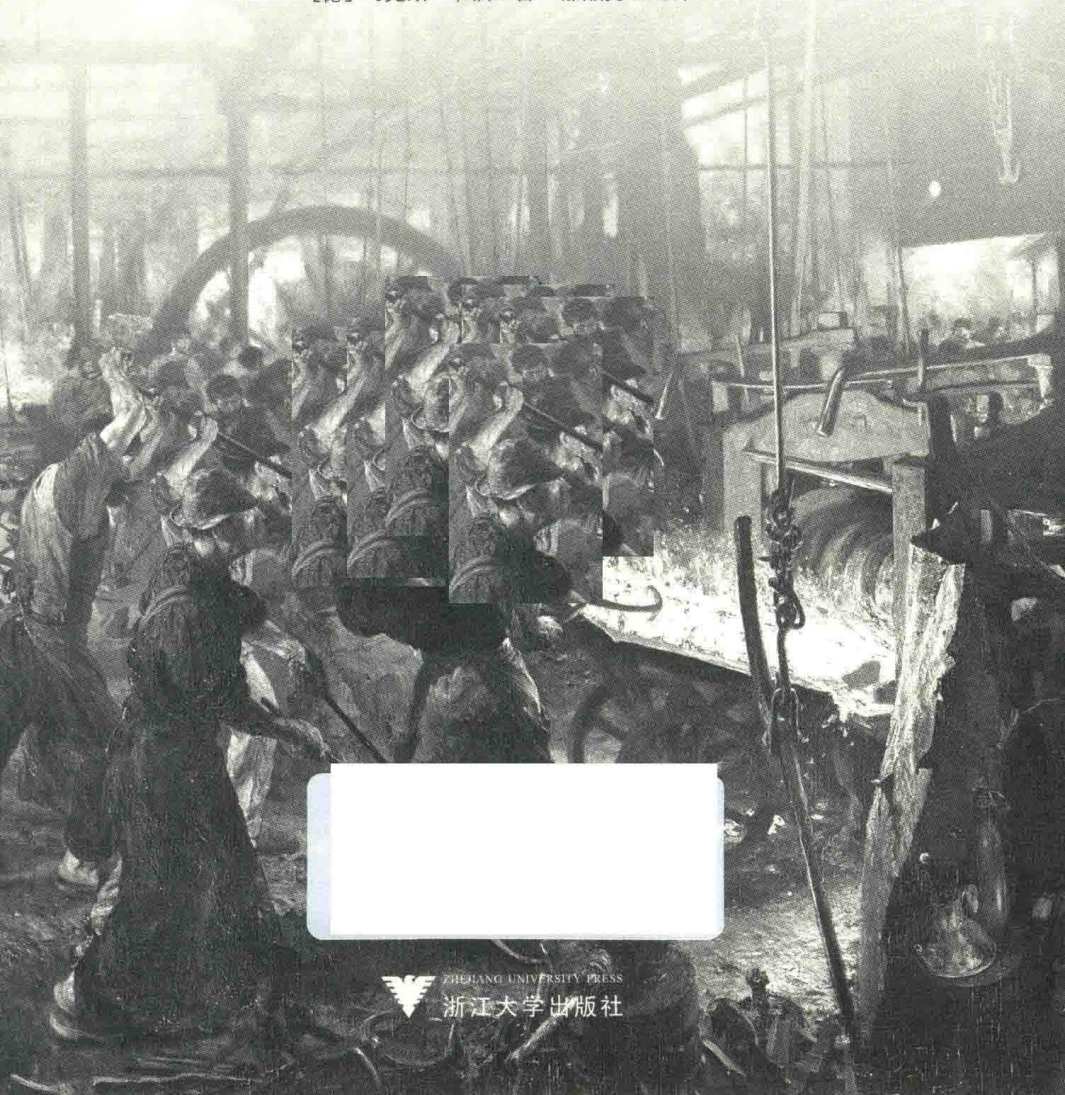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经典重译计划③不朽之作，值得重读

彩绘精读本

#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著 郁喆隽◎选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德) 马克斯·韦伯著;  
郁喆隽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308-17739-9

I. ①新… II. ①马… ②郁… III. ①新教—研究—  
西方国家 IV. ①B97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5331号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郁喆隽 选译

---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牟杨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39-9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cs.tmall.com>

## 新译本导读

### 引子：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

偶尔路过上海的外滩，瞥一眼黄浦江对岸的那些高耸入云的地标建筑，总会让人陷入一种魔幻而矛盾的感受之中。依稀记得，那些大楼耸立的地方，在我小时候是一片农田或者杂乱无章的平房，地平线是平的。然而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所有这一切拔地而起，好似梦幻一般。如果站在黄浦江的另一侧，从浦东的摩天大楼回望浦西，可能会稍稍多出一丝历史感来。外滩的建筑没有那么新，但它们也是在最近一个世纪里才建起来的。它们背后的整个城市，是在过去仅仅一百五十多年里崛起的。相对于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一切实在是太短暂了。今天，站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你可能都会产生如此的感慨。

面对这样的巨变和反差，我们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审美和

感叹的阶段。人们处在深刻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包含着个人和整体两个层面的含义。在个人层面，人生的根本问题在此若隐若现：我辈的同龄人如今基本已经成家立业，不再是当年的青葱少年。其中不少人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美满的婚姻、聪慧的儿女、体面的工作和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收获中也蕴含了疑惑与彷徨：财富究竟有什么用？或者更直接地说，我追求财富是为了什么？工作、职业给我带来了什么？我究竟要追求什么？我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过去若干年的福利增长能否持续？换言之，我们都在急切地追问，过去的成功依靠的是什么。倘若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未来的福祉也将是空中楼阁。

在整体层面，过去 40 年，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人口、家庭、生活方式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都出现了极大的转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过去 40 年所发生的改变，大致相当于欧洲 16 ~ 20 世纪的三四百年之间所发生的变化。有些改变是能够预测的，而绝大多数改变则无法预测。整个社会已经站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分岔点上。巨额财富在短时间内涌入，无疑引发了一系列的困境：例如，人们在价值和道德领域迷失了方向，伦理底线被屡屡突破……在追求和享受财富之外，我们还应当有什么样的

## 坚守与追求？

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这一切难道都纯属偶然？究竟是应该把社会和经济的剧变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引入和冲击，还是要感谢中华文化的积淀与更新？人类的历史、文化和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更多是断裂还是延续？中国无疑不再是稳居天下的“中央帝国”，相信两千年前的“智慧”可以照搬来应对当下国人的问题，不仅带有经验主义的预设，还蕴涵着一种历史的刻舟求剑。文化究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和资源，还是重担和障碍？

常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样一本书——它是一个处在转折和彷徨中的灵魂，对一个处在转折和彷徨中的文明，进行的一次彻底追问。这本书的作者尝试用学术的方式，来反观人生、价值、伦理、生活方式、职业、财富等问题。然而，他所采取的径路连带着家国、文明、宗教和历史的深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他山之石”，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几代人的阅读经验乃至反思意识之中。任何真诚的文本都不会承诺一劳永逸地给出答案，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来回答自己的问题，担当自己的使命。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找到唯一答案，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回答问题的同伴。它所给出的回答尝试，是一个路标、一面镜子、一条小径。

## 韦伯是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和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并称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三位奠基人。虽然他称不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对经济学、国民经济史、社会学、法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无法磨灭的原创性贡献。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864年4月21日，卡尔·埃米尔·马克斯米利安·韦伯（Karl Emil Maximilian Weber）出生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埃尔夫特市（Erfurt）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韦伯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1836—1897）是律师和高级公务员，来自德国西部威斯特法利亚地区的一个纺织工业世家，母亲海伦娜（1844—1919）出身于一个拥有贵族血统的教育世家，他们属于当时典型的德国式严父慈母。父亲属于典型的“享乐人”，积极追逐现世的各种功名利禄，曾经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担任议员，也不拒斥各种俗世享乐；而母亲则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气质。整体而言，韦伯的家境殷实，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

韦伯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最好的文理教育。他喜欢阅读，尤其对历史和古典作品感兴趣。此外，韦伯父母家中经常举行各种沙龙，参与的多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在这种讨论环境中，韦伯受益良多，也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开阔了视野。18岁时（1882年），韦伯进入德国西南部巴登州的海德堡大学求学，大学期间主要修读的课程是法学、经济史和哲学。他的求学生涯可谓一帆风顺。1889年，他以《意大利城市家庭和商业团体公共贸易公司中共责和资金独立原则的发展》获得博士（Promotion）学位。1891年，他又以《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通过了大学授课资格（Habilitation）考试。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严苛的博士学位并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在当时的德国是十分少见的，也说明了韦伯优秀的天资。

1893年，韦伯和远房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玛丽安娜是德国第一代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一生致力于女权主义运动。韦伯过世后，她整理了大量的韦伯手稿和著作，还写作了《马克斯·韦伯传》。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韦伯和他夫人的婚姻一直是“无性”状态，因此没有留下子嗣。

30岁时（1894年），韦伯首先在弗莱堡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的教职，两年之后（1896年）他又接受了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职。1897年，韦伯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再能够正常进行学术工作。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韦伯父母的关系并不融洽，由于工作的缘故，父亲常年不在家。作为长子，韦伯非常能理解母亲的苦衷，对父亲有所抱怨。1896



年夏天，老韦伯在和韦伯发生激烈争吵之后，离开家庭旅行，途中病逝于里加。韦伯因为此事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此外，由于对教授工作尽心尽责，韦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备课和写作，因为过度疲劳而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没法读书，不能写作，甚至不能谈话和睡觉。也有人认为，韦伯的病症可能和他童年时代所患脑膜炎有关。从1898年到1899年，海德堡大学准许韦伯全薪休假，但此后韦伯一直备受病痛折磨，无法恢复工作。他在1900年到1902年再度获得两年的长假，四处旅行。1903年10月，韦伯最终辞去了海德堡大学的教职。“赋闲”在家的韦伯，并没有停止思考、阅读和写作，而是始终保持着极为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分析能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韦伯在病退间歇期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韦伯立刻前往海德堡的预备役医院服役。但是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原因，他只能在大后方负责管理医院和培训官员，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现代官僚体制。但是韦伯对军队和整个政府中人员的低效和推诿感到十分失望，于是于1915年辞职离开了医院。此后，韦伯将时间和精力转移到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中，主要撰写了《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的第一部分。但他一直非常关注战局和国内动向，曾经公开反对无限制潜艇战。一战结束后，韦伯曾作为德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凡尔赛和

会。他原本想用自己的学术和语言能力来为德国争取一个较好的战后条件，但目睹德国的政治人物（例如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不愿意承担责任，寻找各种借口弃人民于不顾而只求自保，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一战后期，韦伯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短暂讲学。1919年，韦伯全家搬到了慕尼黑。他原本准备接替布伦塔诺（Lujjo Brentano, 1844—1931）在慕尼黑大学的讲座教席，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涯。不料1920年6月，韦伯意外地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于6月4日去世。韦伯被安葬在故乡海德堡的山顶墓地，妻子玛丽安娜从《浮士德》中，为韦伯选择两句作为墓碑铭文：“尘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辈再无君。”（*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韦伯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他的人格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一方面，韦伯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爱国者。从他早年的研究与演讲来看，他甚至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青年时代的他曾经真心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够成为一个主人民族（*Herrenvolk*），德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他研究的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他一直坚持某种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和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但是另一方面，韦伯作为一个学者，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自由和客观精神的追求。作为知识分子的韦伯，时刻保持着对德国现实政治走向的批判，

同时也心怀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在一战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德国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发展出现了极不平衡的状况。虽然伴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德国国内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德国内部的阶层、文化和宗教裂痕是十分明显的。作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讨论的公民，韦伯对德国的国内政治充满鄙视，也对德皇威廉二世充满厌恶。他看到，德国的各个政治集团都存在不可弥补的缺陷，政治家也缺乏担当。因此，韦伯对德国的现实充满失望。他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一位先知，他生活在犹太灭国前的黑暗时代。和耶利米一样，韦伯目光如炬，在一战前就已经看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问题，而且尝试在各种场合奔走高呼。但无奈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国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进韦伯的声音。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怎样一本书？

1997 年，国际社会学协会（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进行了一项针对其成员的调查，让每个成员写出 5 本自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最终有 455 位社会学家参与了投票。揭晓的排名中，韦伯一人有两本书列入前十——《经济与社会》位列第一（得票 20.9%），《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位列第四（得票 10.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以同名论文的形式，发表在1904年到1905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20卷和21卷中。<sup>[1]</sup>1903年韦伯从海德堡大学离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逐渐恢复了健康，并重新着手学术研究和写作。同年，他开始为好友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和雅菲（Jaffé）编辑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撰稿。1904年9月到12月，韦伯和好友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一起前往美国，参加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其间他们游历了不少城市，对新大陆的现代性进行了系统考察。此外，韦伯还近距离观察了北美的宗教和商业生活，为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虽然运用了大量的神学材料，但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神学著作。使用神学材料，是论证的题材使然。从该书的实质来看，他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学和哲学的。那么，韦伯为什么要从宗教角度切入，来讨论经济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如下几个视角的回答：

首先，从长期来看，新教（Protestantism）无疑是普鲁士国家的实际立国之本和核心价值。因此，如何来评价新教对德

---

[1] 参见 Max Weber, *Religionssoziologie I*, S.17. 脚注6。——译者注

国社会和欧洲文明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那个时代“政治正确”的影响。

其次，从短时段的学术背景来看，韦伯的好友社会学家桑巴特的研究，对韦伯也构成了影响。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了《近代资本主义》一书。在该书的第三部分中，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问题。桑巴特认为，“获利欲”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而且新教乃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韦伯从他本人的国民经济学训练出发，完全不同意桑巴特的这些结论。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中虽然引用了不少桑巴特的内容，但直接反对他的观点，认为营利欲并非资本主义诞生的主要动力。

再次，从直接的出发点来看，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和人口学发现：韦伯的学生马丁·奥芬巴赫（Martin Offenbacher）在他的论文《信仰与社会分层：巴登州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经济状况的研究》（*Konfession und soziale Schichtung: Eine Studie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in Baden, Tübingen und Leipzig*, 1901）中发现了如下的有趣差异：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州，在外部环境几乎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新教徒的人均课税几乎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而且这一地区虽然天主教占多数（新教占人

口比例 37%，天主教占 61.3%，犹太教 1.5%），但在各种学校中，新教徒的比例和天主教徒出现了倒挂。<sup>[1]</sup>

按照德国学者迪尔克·克斯勒的整理<sup>[2]</sup>，韦伯一生留下的文本大约有 226 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国的 Mohr Siebeck 出版社开始陆续整理韦伯的手稿，并在此基础上出版《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目前尚未全部出齐。全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品和演讲（24 卷）；第二部分：信件（11 卷）；第三部分：讲课与讲课底稿（7 卷）。全集现任主编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韦伯虽然称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式的全才，但其论域涵盖面之广，也颇为惊人——包括了历史、政治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史等诸多领域，而且他在这些领域内均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外，韦伯还留下了不少举足轻重的学术作品，例如《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政治》由两篇演讲稿组成，第一篇是 1917 年 12 月在慕尼黑的《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第二篇是 1919 年 1 月的《以政治为业》（*Politik*

---

[1] 参见：第一章 1—3 节，德文版原注 8 和 11。——译者注

[2] 参见：《马克思·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的附录。——译者注

als Beruf)，比较适合初学者阅读。

毫无疑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它有如下三重含义：首先，它标志着一个转折，即韦伯从对经济史和社会状况的研究转向了宗教伦理研究；其次，它是一个过渡，即结合了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深层次思考和具体历史案例的研究；最后，它也是一个开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宗教社会学文集》（1—3卷）中的第一个案例研究。正因为这个案例受到了德国学界的批判和大量评论，韦伯在一战爆发前后，展开了“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试图通过多文化、多宗教的比较研究，来处理新教研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恰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问题”首次得到了比较明晰的表达。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要点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证是循序渐进、条分缕析的。但在本导论中，我尝试打破原文的顺序与格局，来总结出若干核心的观点。

韦伯区分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资本主义”。他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史和国民经济学的学术训练。他认为，广义的资本主义是以贪财和营利欲为驱动的，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多

种文明之中；而狭义的资本主义是现代西方所特有的，它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第一部分第二章 15 节）。韦伯将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他个人生活极为节约、勤俭，并将资本增值作为目的本身，具有伦理色彩和生活方式的准则，将赚钱作为劳动的唯一目的（第二章 4—14 节）。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早于资本主义。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要战胜的首要敌人是“传统主义”。所谓传统主义是指劳动者和资本家倾向于享受悠闲的生活状态，以及满足现状的一种心态（第二章 19—27 节）。

韦伯进而追问，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从何而来？换言之，这种体现在职业伦理中的工作态度是如何产生的？所以，韦伯考察了“天职”（*Beruf*，职业）一词的来源。他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毫无疑问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而且来自于《圣经》的（德语）翻译者马丁·路德。但是，路德的职业概念一直没有摆脱传统主义——他让人坚守自己的生计，而不要去追求营利。另一位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却截然相反，他具有明显的人世态度，而且将世俗生活作为任务。由此，韦伯就要来说明，一种宗教信仰和职业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亲缘性（第一部分第三章）。

在第二部分第一章中，韦伯重点列举了新教中具有苦行伦理的四个主要承载者。其中他分析得最为详细的是加尔文派。加尔文派具有两个十分有特色的神学教义：“救恩蒙选”和“预



定论”。前者认为，一个人是否被拯救，这种恩典并不能归功于任何人自己的作为，上帝的意旨才是救恩的唯一来源，所有事件都是上帝自我荣耀的手段。而后者则认为，一个人是否被拯救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2—3节）。上帝的意旨无法改变，救恩也无法失去。因此，加尔文派的信徒会陷入一种空前的孤寂感中。他们将荣耀上帝作为世俗生活的唯一目的，并且要将其体现在职业劳动中（4—5节）。换言之，加尔文派的信徒将职业劳动作为消除救赎焦虑的目的，作为自己被拯救的确证手段。于是，就形成了每时每刻、成体系的自我检视（6—9节）。这种生活方式明显有别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徒，也不同于路德派信徒。这种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苦行特征，也就是要消除无拘无束、充满本能的生活享受，坚持不懈地在俗世中进行职业劳动，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秩序、内化为人格的“世俗苦行”伦理（10—13节）。

在第二部分第二章中，韦伯选取了一些神学著作来说明宗教力量在实践中的作用。他着重以清教徒巴克斯特为例。巴克斯特认为，真正可耻的是在财产上安然歇息，享受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懈怠与肉欲；而且，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因此，巴克斯特提出信徒要刻苦、持续地进行肉体和精神劳动。劳动具有双重意义：它是苦行手段；也是抵御诱惑的预防针。甚至，劳动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本身（3—5节）。所以，巴克斯特